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complex, abstract composition. It features a dark, textured area on the right side that resembles a map or a satellite image, with various shades of brown, black, and white.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lighter, more textured area that looks like a close-up of a stone or a similar material. The overall effect is one of depth and complexity, with various lines and shapes that suggest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history.

當代小說與  
集體記憶  
——敘述文革

許子東◎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 / 許子東  
著. - 初版. - 臺北市：麥田出版：城  
邦文化發行，2000 [民 89]

面；公分. - (麥田人文；40)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469-087-3 (平裝)

1. 中國小說 - 民國 38- 年(1949- ) - 評論

827.88

89009611



麥 田 人 文

王德威／主編



麥田人文 40

# 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

Narr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and Collective Memory

作者／許子東 (Xu Zi Dong)

主編／王德威 (David D. W. Wang)

責任編輯／詹宜夔 林志懋

發行人／陳雨航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號6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Penthous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2060833 傳真：(603)2060633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〇年七月

售價／三二〇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469-087-3

Narr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and Collective Memory

Copyright © 2000 by Xu Zi D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David D. W. 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6F, No. 251, Sec. 2, Hsin-Yi Rd., Taipei, Taiwan.

# 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

敘述文革

許子東

◎

著

---



## 作者簡介

許子東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東亞語言文化系文學碩士，香港大學中文學系哲學博士。曾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及香港大學、芝加哥大學客座研究員。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復旦大學文藝學美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著有《郁達夫新論》（浙江文藝，一九八四）；《當代文學印象》（上海三聯，一九八七）；《當代小說閱讀筆記》（華東師大，一九九七）。編選有《香港短篇小說選一九九四—一九九五》、《香港短篇小說選一九九六—一九九七》（香港三聯，二〇〇〇）等。





# 目錄

導論 ..... 11

第一章 「文革敘述」中的災難起因與前兆 ..... 29

- 1 災難之前，女主人公善良美貌、生活幸福
- 2 災難之前，女主人公的感情生活不無缺憾
- 3 男主人公在災難之前有某種缺點或缺陷
- 4 男主人公在災難之前被認為犯有過失
- 5 男主人公在災難之前犯錯而不自知

第二章 「文革敘述」中的災難降臨方式 ..... 59

- 6 主人公注意到「旁人奇怪的目光」
- 7 主人公在大字報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 8 主人公為好友所背叛

- 9 主人公參加某種會議
- 10 女主人公和領導的關係受到懷疑
- 11 主人公被抄家
- 12 主人公獲得某種罪名，受到某種處罰
- 13 主人公為家人兒女所背叛
- 14 主人公下鄉、勞改
- 15 主人公受傷
- 16 主人公自殺

### 第三章 「文革敘述」中的拯救主題

- 17 男主人公忍受身體苦難，為民間女子所救
- 18 男主人公忍受精神苦難，為知識女性所救
- 19 女主人公在災難中為知識男性所救，獲得愛情
- 20 男主人公在災難中獲智慧長者指引
- 21 主人公在災難中獲親人救援
- 22 主人公在災難中獲上級救援
- 23 主人公在災難結束前病故或死於意外

### 第四章 「文革敘述」中的反思與懺悔

- 24 災難之後，女主人公原先的感情缺憾得到彌補，生活更加幸福

- 25 災難之後，女主人公的敵人受到懲罰（有人對災難負責）
- 26 災難之後，男主人公獲更高官職，地位上昇
- 27 災難之後，男主人公重遊故地，感謝苦難
- 28 災難之後，男主人公反思災難中的是非恩怨，找不到具體的敵人
- 29 災難之後，主人公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過失，但拒絕懺悔

第五章 「文革小說」中的不同敘事模式 ..... 207

- 一 契合大眾審美趣味與宣洩需求的「災難故事」
- 二 體現「知識份子—幹部」憂國情懷的「歷史反省」
- 三 先鋒派小說中有關文革的「荒誕敘述」
- 四 「紅衛兵—知青」視角的「文革記憶」

結 論 ..... 267

略論海外華文小說中的「文革敘述」 ..... 279

- 一 《尹縣長》：海外讀書人的「文革故事」
- 二 《霸王別姬》：有關文革的「大眾想像」
- 三 《鴻》：中國女人的「文革記憶」

對「文革」的兩種抗議姿態 ..... 309

- 一 「文革文學」的新進展
- 二 被抄家者與紅衛兵闖將
- 三 兩種申辯姿態
- 四 不同的反思方式

**附 錄 五十部作品目錄、作者簡介與參考書目** ······ **321**

- 一 目錄
- 二 「五十部作品」作者簡介
- 三 主要參考書目

# 導論

阿多爾諾 (Theodor Adorno) 在《否定的辯證法》(Negative Dialektik) 中的一段話後來常被選摘引用：「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你已不可能再寫詩——這樣說也許是錯的。但提出一個不太文明的問題卻沒有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你能否繼續生活？……」●中國大陸的情況似乎稍有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文學創作也已幾乎變成不可能，除非你敘述文革——為甚麼要敘述或閱讀「文革的故事」？是否也是因為要在文革以後繼續生活？

事實上，一九七七年以來相當多數的中國（特指大陸，下同）當代小說，都和文革背景有關。如何回憶和敘述文革的過程與細節，如何梳理和解釋文革的來源與影響，這是一個很少中國當代作家能夠忽視和迴避的題目。假如不先講述文革的故事，倘若不先給文革一個「說法」（借用張藝謀電影人物秋菊的說法），很多中國作家（及讀者）似乎還不能從文化、道德及價值觀的斷裂心創中真正「生還」，他們與傳統文化及「五四」的種種精神聯繫都很難延續。雖然文革小說的創作動機與風格可以很不相同：有的作品被寫成文革的歷史見證，有的作品直接對文革做政治控訴，也有作品，意在形式探索或討論文化課題，卻以文革為敘述背景。但所有這些小說形式的「文革敘述」，

不僅已成為當代文學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之一，而且也是以現代漢語書寫的讀者最多、影響最大的一種「文革敘述」。因為某些特定歷史文化條件的原因，文學（尤其是小說），二十年來已成為國人談論、敘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而對年輕一代及後人及「外人」來說，所謂文革，首先是一個「故事」，一個由不同人所講述的「故事」，一個內容情節大致相同格式細節卻千變萬化而且可以引出種種不同詮釋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小說版本，很可能會比政治文獻版本或歷史教科書版本流傳更廣、影響更為深遠。

本書想對文革故事的小說版本做一些抽樣的形式分析。研究重點，並不在於「文革故事」與作為歷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之間的關係——本人無力、也無意去努力考證探究當代小說中「文革故事」是否反映、記錄、再現或表現了文革的「歷史真實」（如果真有所謂「歷史真實」的話）。我所關心的，只是種種不同的「文革故事」在小說形式中是如何被「敘述」的，為甚麼會被這樣或那樣「敘述」，以及種種不同「故事」之間的某些共通的與小說形式有關的敘述規則。

本書一方面並非通過文學作品做歷史研究，另一方面也不想將有關文革的小說敘事模式只作為純文學現象來討論——雖然這些文革小說，放在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看，顯然具有很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其中有些作品，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本世紀最後二十年大部分重要的小說家，如王蒙、張賢亮、王安憶、韓少功、阿城、史鐵生、張承志、莫言、余華、馬原、賈平凹等，皆因敘說他們的文革經驗而著名。但本書的重點，卻並不在討論這些文革小說的純藝術價值和文學史意義。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是在具有比歷史、政治、法律、新聞等領域相對「寬鬆」

的條件下，才成為知識分子和民眾談論「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途徑。所以文革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兼有歷史記載、政治研究、法律審判及新聞報導的某種功能，而且這些「故事」的寫作與流通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歷史、政治、法律、傳媒乃至民眾心理的微妙制約。當小說家用文學形式將他們個人的文革經驗變成大眾論述時，他們實際上有意無意地參與了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的創造過程。這種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與其說「記憶」了歷史中的文革，不如說更能體現記憶者群體在文革後想以「忘卻」來「治療」文革心創，想以「敘述」來「逃避」文革影響的特殊文化心理狀態。而這種小說形式的「文革集體記憶」的書寫過程，正是本書研究的全部要點所在。

本書將以一九七七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上寫作與發表的五十部（篇）●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長短篇小說為例，整理和探討文革小說的基本敘事模式，同時也分析這些文革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及其敘事功能，最後再辨察這些文革小說的幾種基本敘述類型。所以，本書的討論對象，將不包括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間（即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小說作品，也基本不涉及文革中和文革後在香港、台灣及海外發表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文創作（筆者另有專文討論陳若曦、李碧華、張戎等人在台灣海外書寫的文革故事，作為附錄收入本書，供讀者參考）。本書最基本的研究前提，是假定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形形色色的「文革故事」，具有敘述模式上的某種相似性，但也存在著重要的差異。這種敘述模式的相似與相通，證實著當代小說所書寫的「文革記憶」的「集體性」；而這種敘述模式之間的差異，則顯示著各種文化力量對「文革集體記憶」書寫過程的不同制約。

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受到普洛普（Vladimir Propp, 1895-1970）分析俄國民間故事的方法的啟發。普洛普在研究俄國民間故事的分類和組織時，曾在一百個童話中概括出三十一種順序不變的功能及七個人物角色（一）反角；（二）施主「供養人」；（三）幫手；（四）公主「一個被尋求的人」和他的父親；（五）派遣人；（六）英雄「尋求人或受害人」；（七）假英雄<sup>③</sup>。普洛普在二〇年代的蘇聯所從事的這項童話研究，直到五、六〇年代才被譯成英文，卻對英美學院裡的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羅伯特·休斯（Robert Scholes）這樣評價普洛普的研究：「儘管小說研究的傳統要追溯至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但結構主義小說研究則幾乎可以說是從弗拉基米爾·普洛普的俄國神話故事研究開始的。普洛普為小說研究提供了『簡單形式』，這種簡單形式對結構主義思想一起著一種重大的推動作用。」按照羅伯特·休斯的概括，普洛普的工作就是「從一組擁有近似造型的一百個故事中，努力抽取一個原始故事的結構。這個原始故事的三十一個功能包括了在這整組故事中的全部結構可能性」。普洛普「關注故事的形式特點，它的基本單位以及制約這些基本單位的組合的那些規則。他實際上是在為某種敘事體裁制定一部語法和句法」<sup>④</sup>。本書在考察「五十部作品」的基礎上，也會在文革小說千奇百怪變化多端的災難故事中列出二十九個有一定秩序的「情節功能」與四個基本敘事階段（初始情景：災難之前的狀況；情景急轉：主人公陷入某種災難；情景急轉之後的意外發現：主人公忍受災難並獲得某種解救；結局：主人公脫離災難，反思災難中的是非恩怨，感謝苦難並拒絕懺悔）。在討論上述「事序結構」的排列組合秩序的同時，本書也將分析五種主要人物角色（一）受難者；（二）迫害者；（三）背叛者；（四）旁觀者；（五）解救者）在「文革敘述」中的



不同功能。誠如羅伯特·休斯所言，普洛普的研究「教我們在分析情節功能和人物角色時，注意它們之間精確的和細緻的相互聯繫」<sup>⑤</sup>。而筆者在這本小書中想要做的事，也正是探究「文革敘述」中情節模式與角色功能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而討論小說形式的「文革集體記憶」的若干書寫規則。換言之，即討論「文革敘述」的特殊「語法和句法」。

對中國大陸的讀書人來說，與文革拉開距離其實是非常困難的。試想朱自清的學生王瑤在四〇年代末撰寫「新文學史稿」時，一九一七年的〈文學改良芻議〉似乎已很久遠。但同樣相隔三十二年，筆者一九九八年在國內某學術會議上宣讀有關文革書寫的論文時，講者與聽者都好像在討論昨天的事情：會後引起爭議的仍是「當初參與造反是否需要懺悔」之類直接牽涉切身經歷的倫理課題。很多現在海內外知名的學者專家或政府領導或先鋒派文人，回想文革似乎都有些難言之隱，或者始終背負著解不開（或不願打開或自以為已不存在）的包袱情結。在缺乏心理距離的情況下，感性材料與私人記憶就一直在文革書寫中扮演重要角色。用「敘述」重組知青或右派生活的意義，用「故事」療治自己也不承認的心創，顯然是比「娛樂讀者」或「為藝術而藝術」更為實在的創作動因。但另一方面，再特殊的感性材料再隱祕的私人記憶，在文革書寫中又總是要以歷史「大敘述」的面目出現，總是伴隨著對災難前因起源後果教訓的解釋與總結。換言之，有關文革的私人記憶必須要以公眾記憶的語法才能被書寫被閱讀。每個敘述者都以青春、傷勢，甚至死者的名義擔保他們的故事的真實，但讀者卻分明在不同的故事中看到不同的文革歷史。這些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